



書叢察觀

2

言 罪 學 政

著 旦 光 潘

行發 社察觀 海上



書叢 察觀

2

言罪學政

著旦光潘

• 社 察 觀 •

政學罪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十一月三版

五三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三
一七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著者

潘

光

旦

發行人

儲

安

平

發行所

觀

察

社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基本定價：金圓五元四角

弁言

抗戰避地期間我所寫涉及思想、文化、青年、教育、政治等题目的若干文稿已於戰事結束後輯成自由之路一書，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書共收稿二十二篇，其中六篇寫於戰前三四年內，自係復員後從故紙堆中搜尋出來的，其餘十六篇則爲復員前後的產物。全書討論到的生活方面大致與自由之路相同，所代表的觀點亦彼此呼應，因此，我不妨說它是自由之路的一個前驅，同時也是一個後殿。

本書中的文稿都是曾經一度在刊物上發表過的。計周刊有觀察、華年、獨立評論、時代評論（昆明）、民主周刊（昆明）、世紀評論、平論（上海）、清華周刊、新生代（重慶）、民主一周刊（重慶）、京滬周刊、再生、軍民周刊（昆明）。日刊則有天津大公報、昆明正義報、與北平平民日報。又月刊兩種，一是人文（上海鴻英圖書館），一是滄怒新潮（保山旅昆同學會）。如果負責這些刊物的朋友們不加督促，我怕就不會有這些文稿了。此番整補後，輯印成書；飲水思源，我應該在此鄭重表示謝意。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元月，潘光旦。

上

篇

目次

輯印弁言

上篇

一	說童子操刀（一九四六）	一
二	文明往那裏走？（一九四七）	一三
三	歐洲局勢與思想背景（一九三七）	三五
四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一九四七）	四三
五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一九四六）	五三
六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一九四七）	六四
七	派與匯（一九四六）	八一
八	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幹（一九三四）	一二九

中篇

九	國難與教育的懺悔（一九三六）	一四五
一〇	再論教育的懺悔（一九三六）	一五二

下篇

一一	說鄉土教育（一九四六）	一六〇
一二	生計、事業、興趣（一九四七）	一六九
一三	一封給大學青年的公開信（一九三四）	一七八
一四	歡送遊美學生的一封信（一九三四）	一八五
一五	省察第一（一九四七）	一九二
一六	學與政與黨（政學關係三論之一）（一九四六）	一九七
一七	政治信仰與教育自由（政學關係三論之二）（一九四六）	二一二
一八	政治必須主義麼？（政學關係三論之三）（一九四六）	二二〇
一九	說軍與民（一九四六）	二三〇
二〇	未經『國定』的一種公民讀本（一九四六）	二三九
二一	所望於協商會議者（一九四六）	二四七
二二	毋我斯和平統一（一九四五）	一五五

一 說童子操刀（一九四六）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中國有句老話說，童子操刀，其傷實多。這句話恰好形容了三百年來科學進步的一半的結果。刀是一種人所發明的工具，本體無所謂好壞，祇是用途有好壞，用得適當就好，不適當就壞。刀自身不能發揮它的效用，發揮它的效用的是人，而人卻有好壞之分，有適當不當或健全不健全之分；以適當而健全的人來利用一種工具，其功用或結果大概也是適當、健全、而有益的，否則是有害的。童子操刀，指的是後一種的可能的功用。大凡人利用事物，全都得用這眼光來看；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自然的事物如此，人所自造的文物，包括一切比較具體的工具製作與比較抽象的典則制度與思想信仰在內，尤其是如此，說『尤其』，正因為它們是人造的，是人的聰明的產物，如果控制無力，運用失當，以至於貽禍人羣，那責任自然更較嚴重；人的聰明能產生這些，而竟不能適當的控制運用這些，至於尾大不掉，自貽伊戚，也適足以證明那聰明畢竟是有限罷了。

我們也得用這種眼光來看科學。科學也正復是一種人造的工具，一點也不少，一點也不多。它本身也無所謂好壞，好壞繫於人的如何控制運用。一部分人，見到科學昌明以後，人

類的一部分獲取了種種利用厚生的好處，於是就讚揚科學，歌頌科學，對科學五體投地，認為是人類的福星。我想除非這一部分人中間，有人生就的是一副詩人性格，動不動要發抒他的感傷主義，這是大可以不必要的。另一部分人，見到在同時期以內，科學表現了不少的摧毀敗壞的力量，特別是在歷次的大小戰爭裏，於是就批評它，詛咒它，認為人類遲早不免因它而歸於寂滅，而自原子能的發明以後，這末日可能來臨得很早。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感傷主義的表示，大可以不必要的。

我們要認清楚，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童子操刀，問題絕對的不在『刀』，而在『童子操』。人運用科學，問題也決不在科學，而在人的運用與運用的人。我們要問，這種用科學的人是不是真能善於運用，真有運用的資格？換一種問法，就是，他配不配運用？所謂善，所謂有資格，所謂配，指的是兩層相連的意思。一是他在運用之際，能隨在參考到人羣的福利，始終以人羣福利為依歸；二是他，運用者自己，必須是一個身心比較健全的人，至少要健全到一個程度，足以教他實行這種參考，篤守這個依歸。這兩層意思，第一層指人的運用，重在運用，第二層指運用的人，重在人。

我指出這兩層意思的分別來，因為『人』與『運用』之間，比較基本的終究是人，人而健全，運用是沒有不得當的，反過來就很難想像了。而近年以來，中外論者鑒於科學對人羣的利害參半，對於有害的一半總說是『運用失當』，難得有人更進而提出如下的一類問題。

失當的原因究竟何在？此種失當是偶然的呢？是一時計慮的錯誤而可以避免的呢？還是有些基本的因素教它不得不發生而隨時可以發生的呢？這基本的因素裏可能不可能包括人自己？可能不可能人本身就不適當，因而他對於科學的應用也就無法適當？好比騎馬，馬是工具，人是馬的駕馭者，騎馬之人雖未嘗不聰明靈活，未嘗不略知駕馭之術，但也許年事太輕，或適逢酒後病後，神智不夠清楚，終於把馬趕進了一個絕境，造成了斷頭折股的慘劇。這又回到童子操刀的比喻了。然則問題還不在一個操字，而在童子本身。

童子操刀，最淺見而感情用事的人責備操刀。其次也祇是在操字上做工夫，總說操不得法，誠能操之得法，問題就解決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愛因斯坦（Einstein）在加利福尼亞州工科學院（C. I. T.）對學生作公開演講，說『光輝燦爛的應用科學既節省了工作的時間，減輕了生活的負擔，而對於人類幸福的促進，又何以如是其少呢？我們簡單的答覆是：我們還沒有學到致用之道，一些明白事理的致用之道。要你們的工作得以增加人類的福佑，祇是瞭解應用科學是不夠的。你們得同時關切到人。人的自身與人的命運必須始終成爲一切技工的主要興趣。在你們繪製圖表與計算公式的時候，隨在不要忘記這一點』。這一番話是不錯的，從愛氏的嘴裏說出來，自然更有分量；但是不夠；單單就操字上找答覆，而不就童子身上找答覆，所以不夠。愛氏在這話裏，也似乎只見到『人的運用』，而沒有見到『運用的人』。要見到了運用的人，問題才搔到了癢處。

三百年來，物的研究與認識。物的控制與運用，誠然是到了家，到最近原子能的發見與原子彈的試用成功，此種認識與控制，更是將近登峯造極。但人自己如何？人認識自己麼？人更進而能控制自己麼？我們的答覆是，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之道。人自己也是一種物體，這物體是一個機械體也罷，是一個有機體也罷，它總是一個極複雜的力的系統。我們對於這力的系統，根據物有本末事有先後之理，我們原應先有一番清切的瞭解，先作一番有效的控制。但三百年來，科學儘管發達，技術儘管昌明。卻並沒發達與昌明到人的身上來，即雖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闊不切，便是破碎支離。結果是，我們窺見了宇宙的底蘊，卻認不得自己；我們駕馭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卻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欲；我們誇着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卻管理不了自己的行爲，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這正合着好像是耶穌講的一句話，我們吞併了全世界，卻是拋撇了自己的靈魂。比起這句話來，上文童子操刀、醉漢騎馬一類的話，還算是輕描淡寫的。

人至今沒有適當的與充分的成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很顯明的。人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第一，人雖然也是一種生物，並且是一種動物，但生物學與動物學不管，至少是不大管，或雖管而其管法和對於一顆樹、一個蟲、一隻青蛙的管法沒有分別，即雖管而於人之所以爲人不能有所發明。第二，人類學與社會學，以至於其它各種社會科學都算是以人做對象

的科學了；但說來可憐，這對象是有名無實的。這些學問祇曉得在人身外圍兜着圈子，像走馬燈中走馬之於蠟燭一般。體質人類學算是最接近的，但它的注意範圍很有限，除了活人的那一個皮囊，叫做形態的，和死人的那一副架子，叫做骨骼的，以及這兩件事物在各種族中間的比較而外，也就說不上多少了。試問我們認識了這個皮囊和掛皮囊的架子，我們就算認識了人麼？所謂文化人類學，名為研究文化的人，實際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為是研究產生者，實際是研究了產物，至多也祇是牽涉到一些產生者和產物的關係，以及產物對於產生者的一些反響；有的文化人類學家甚至於祇看見文化，祇看見文化的自生自滅，根本不看見人，即或偶然見到，所見到的也不過是無往而不到文化擺布的一些可憐蟲而已。因此，產生者本身究屬是甚麼一回事，我們的認識並沒有因文化人類學者的努力而增加多少。社會學是人倫關係之學，似乎所重在關係的研究，而不在此種關係所從建立的人。社會學的對象是人倫之際，要緊的是那一個際字，好比哲學的一部分的對象是天人之際一般，所以在不大能用抽象的腦筋的學子往往不免撲一個空。所撲的既然是一個空，不用說具體的人是撲不着的了。經濟學原應該一面研究物力，一面研究人欲，然後進而研究物力與人欲的內外應合，兩相調適；但截至目前為止，無論是正統派的經濟學，或唯物論的經濟學，似乎始終全神灌注在人身以外的物力的生產與支配之上，而於人欲的應如何調遣裁節，完全翫置不問。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以有限應無窮，前途必有坐困的一日，即行將來臨的原子能時代恐也不成

例外；而不幸的是，問題中那無窮的一半恰好就是經濟學所『無視』的一半。政治學與法律學都是所謂管理衆人的學術，而它們所講求的管理方法都是甲如何管理乙，張三如何管理李四，而不是甲與乙，張三與李四，如何各自管理自己，或於管理別人之前，先知所以管理自己。總之，各門社會科學犯着一種通病，就是忘本逐末，舍近求遠，避實趨虛，放棄了核心而專務外圍，所謂本、近、實、與核心，指的當然是人物之際的人、和人我之際的每一個人的自己而言。這便是三不管中的第二不管。

第三，人體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一類的科學在人的研究上我們承認是進了一步。它們進入了人身。上文所說的那種通病它們並沒有犯，我們不能說它們『迂闊不切』。它們犯的是另一種通病，就是上面也提到過的『支離破碎』。所謂分析的方法原是三百年來一切研究具體事物的科學的不二法門。科學方法名爲分析與綜合並行，而實際所做的幾乎全部是分析工作。但分析就是割裂的別名，割裂的結果是支離破碎，這在人以外的物經得起，人自己卻經不起，死人經得起，活人卻經不起。無論經得起經不起，支離破碎的研究，零星片段的認識，等於未研究，不認識，因爲人是囫圇的、整個的、並且是箇別的囫圇或整個的，而零星片段的拼湊總和並不等於整個。總之，截至最近幾年爲止，即在這些直接應付人的科學裏，人也未嘗不落空。我說截至最近幾年，因爲一小部分生理學家、病理學家、特別是精神病學家，近年已經逐漸看到這一點，認爲有機體是不容分解的，人格是不容割裂的，而正在

改換他們的研究方法中，但時間既短，成就自然還有限。

總上三不管的議論，可知人類自己對於人之所以爲人，每一個人自己對於我之所以爲我，至今依然在一個『無知』與『不學』的狀態中。『不學』的下文是『無術』，就是，既不認識自己，便無從控制與管理自己。人不能管制自身，而但知管制物，其爲管制必然是一種胡亂的管制；人對於自身系統中的力，不知善用，對於其意志、理智、情緒、興趣、欲望，不知如何調度裁節，而但知支配運用身外的種種物質系統中的力，其爲運用必然是一種濫用，濫用的結果必然是『傷人實多』，而這個人字最後不免包括濫用者自己。這在上文已經預先籠統說過，但到此我們更可以說得明細一些。

人對自身的認識與控制是一種尙待展開的努力。此種努力分兩層。一是就整個屬類言之的。人也是物類的一種，但究屬與一般的物類不同，他有他的很顯著的特殊性，惟其特殊，所以研究的方法與控制的技術勢必和其它的物質不能一樣。上文圖或整個之論便是屬於研究一方面的。至於控制，卽就此人控制彼人而言，我們就不適用所謂『集中』『清算』或『液體化』一類的方式，這些都是把適用於一般物質的概念與方式強制的適用到人，此其爲適用也顯然的是一種不認識的適用。不過更重要的是第二層。人是比較唯一有理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也正唯如此，我們才產生了關係複雜的社會與制作豐富的文化。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圖的，而其所以爲有機、所以成爲圖，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個別的

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便又勢須另換一路：即事實上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口之中，只是絕少數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每一箇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闊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謀而自外強制的。前人的經驗，無論中外，其實早就看到了這一層道理，所謂『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一類原則的話即是。不過看到是一事，做到又是一事，以前雖也有過大致做到的賢人哲士，但總屬少數，今後人的學術的任務，我以為就在更清楚的闡明此種看法，更切實更精細的講求它的做法，而此種學術上的任務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務。目前的學術與教育是已經把人忘記得一乾二淨的。學不為己而為別人，是錯誤，學不為人而為物，是錯誤之尤，目前該是糾正這錯誤的時機了。

有了明能自知與強能自勝的箇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健全的社會意識由此產生，適當的團體控制由此樹立；否則一切是虛假的，是似是而非的，即，意識的產生必然的是由於宣傳，而不由於教育，由於暗示力的被人漁獵，而不由於智情意的自我啓發，而控制機構的樹立也必然是一種利用權力而自外強制的東西。這又說着當代文明人類的一大危機了。一般人對於自己的情欲，既裁節無方，控制乏術，有恐怖既不知善自鎮攝，有憂慮又不知善自排遣，有疑難更不知善自解決，於是有野心家出，就其應裁節處加以欺誑的滿

足，應鎮攝與排遣處，一面加以實際的煽揚恫嚇而一面加以空虛的慰藉護持……；野心家更一面利用宣傳的暗示，一面依憑暴力的挾持，於是一國之人就俛首帖耳的入了他的掌握，成爲被控制者，成爲奴隸；其間絕少數稍稍能自立的，即自作控制的，亦必終於因暴力的挾持而遭受禁錮、驅逐、以至於屠殺。獨裁政治和極權政治不就是這樣產生的麼？希特勒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罡星不就是這樣應運而下凡的麼？

甚麼是野心家？從本文的立場看，野心家也就是最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幸的又有一些聰明才幹的人。一個人既不能控制自己，別人也無法控制他，就是野；『野獸』、『野蠻』、『野心』所指的全都是控制的不在與不可能。希特勒是一個富有欲望的人，他尤其是愛權柄。他自己不知所以運用意志的力量來控制這欲望，反而無窮盡的施展出來，一任這欲望成爲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見得愈大，控制了德國不夠，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於全世界。有一個笑話不是說希特勒拜訪上帝，上帝不敢起來送行，深怕他一站起來，離開寶座，希特勒就要不客氣的取而代之麼？這真十足描寫了野心家愛權若狂、而絲毫不知裁節的心理。不過從控制德國以至於全世界，但憑欲望是不夠的，他必須運用物力，必須駕馭科學，規模之大，又必須和他的欲望相配合，於是他又從人的控制進入了物的控制，從人力的濫用進入了物力的濫用。不過希特勒不能自己直接利用物力，他仍須假手於其它能利用物力的人，而就當時德國與其鄰邦的形勢而論，因爲大部分直接運用物力的人，例如科

學家之類，向來沒有講求過自我控制，自作主張，也就服服帖帖的由他擺布，受他驅策，至於肝腦塗地而不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所由演成的因緣不就是這樣的麼？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文明人類大部分的禍患，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是由於人自己釀成的，而其所由釀成的最大原因，便是自我控制的不講求與缺乏。這種局勢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而今日所以加烈的緣故，則在，一方面，自我控制的力量雖沒有增加，甚或續有減削，而，另一方面，人對於物力的控制的力量，則因科學的發達而突飛猛進，終於使兩種力量之間，發生了一個不可以道里計的距離。社會學家稱此種不能協力進行的現象爲『拖宕』。拖宕一名詞是何等的輕淡，而其所釀成的殃禍却真是再嚴重沒有。不過這種嚴重的程度，一直要到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束，原子彈發明以後，才進入一部分人的深省。原子分裂所發生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以視蒸汽的力量，電流的力量，不知要大出若干倍數。惟其大，所以更難於駕馭控制。大抵爲了破壞的目的，在制敵人的死命的心情之下，此種控制比較容易，所以原子彈是成功了。但爲了建設與人類福利的目的，控制的工夫似乎要困難得多了。淺見者流不斷的以進入原子能新時代相誇耀，把原子能可能產生的種種福利數說得天花亂墜，不過沉着的科學家卻不如是樂觀。卽如英國軍事委員會的科學顧問艾里斯教授（Ellis）說，我們可能用原子能來駕駛海洋上的巨輪，但爲了保護乘客與船員，所必需的一種防範的機構一定是